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2012

SOUTHWESTERN CHINA CULTURAL STUDIES

主编 杨福泉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2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SOUTHWESTERN CHINA CULTURAL STUDIES

主 编：杨福泉

副 主 编：杜 娟 李吉星

编 委：郭 净 刘景毛 木霁虹

秦树才 周智生 王东昕

段玉明 刘 弘 石朝江

邵志忠 张 文

执行编辑：康春华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 2012 : 全 2 册 / 杨福泉主编 . - 昆明 : 云南科技出版社 , 2012.12

ISBN 978-7-5416-6865-4

I . ①中… II . ①杨… III . ①文化史—研究—西南地区 IV .
① K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20148

责任编辑: 赵 敏

唐坤红

封面设计: 张湘柱

责任校对: 叶水金

责任印制: 翟 苑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昆明毕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x1230mm 1/32 印张: 21.625 字数: 460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0.00 元 (共 2 册)





序

杨福泉

由我院历史、文献所具体编辑，由西南数省历史文化学界同仁加盟和支持的《中国西南文化研究》，迄今已经出版了 18 期。正可谓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小树生长，日久成林。这本论集，如今已经汇集了一批研究西南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成果。这本论集最初聚焦西南历史文化，发表了很多有分量的基础研究之作；后来，论集也注重西南历史文化变迁的研究，从历史学、文献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角度来凝视西南，研究西南，在原来的基础上拓展了研究领域和视野。

一个区域学术的发展和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要有长年累月的积累。对中国西南历史文化的研究，从方国瑜、江应樑等前辈学人，到童恩正、李绍明等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一代学界才俊，筚路蓝缕，辛勤耕耘，做出了卓尔不凡的成就，献出了他们毕生的心力，他们的学术生命，如蜡炬之光，照亮了后学者之路。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使西南历史文化研究之路群贤毕集。他们淡泊明志，甘于寂寞，互相切磋砥砺，收获春华秋实。当代中青年学人弘扬前辈学人的治学精神，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但又不忘独辟蹊径，



补遗拾阙。已出版的这些论集中，不乏珠玑之见，创新之论。

我一直认为，中国文化浩博宏富，洋洋大观，要建构中华之学的宏伟大厦，必须要从一砖一瓦开始，所以，各个区域之学，单一民族之学，是中华之学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治学自然要有高屋建瓴的宏观鸟瞰和研究，但宏观研究要建立在诸多深钻细研、发微阐幽的微观研究之上，只有把区域之学、微观之学做好了，才能有扎实牢固的基础来构建宏观之学，就如盖房子一样，基础要打好打牢，否则将会有空疏浮泛和头重脚轻根底浅之弊。我们这本论集，立足西南边疆，聚焦西南文化，就是以这样的学术理念来治西南之学，为中国的学术大厦增砖添瓦，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园林培植花草。我相信，如此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天长日久，必见正果。如果将中华文化的研究也比喻为一条大江，那这本论集能成为汇聚涓涓细流的一条小河，流入这条大江，那也就非常有意义了。

2 当今中国，正在发生社会文化的重大变迁，西南边疆，概莫能外。我们既要沉潜学海，钩沉考证，梳理国故，又应直面现实，深入草根，关注民生，有所心得，发而为文。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学子拳拳之心，尽书生绵薄之力。这也是《中国西南文化研究》的主旨。是为序，与同仁共勉。



目 录

1/从“毒”字说开去	
——朱德与唐继尧关系中的一个问题	谢本书
6/胡汉民与云南河口起义	范德伟
24/《滇军政府讨满洲檄》相关问题论析	
——兼及《孙文布告大汉同胞书》	潘先林 杨朝芳
36/近代“云南人”意识的勃兴	
——以《云南》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周立英
55/从《西南边疆》载文看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意识	娄贵品
64/三十年来云南近现代经济史研究述论	罗 群
85/试论云南商会的社会经济功能	刘鸿燕
111/浅析近代滇西白族商业的发展	
——以鹤庆商帮发展史为例	赵启燕
134/西南联大师生边疆调查述评	许新民
149/吴大猷抗战期间居滇生活及科研述略	何斯民
155/战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之昆明行	朱 俊
165/明清时期云南汉移民文化扩散特点研究	
	李晓斌 段红云 尹记远



中国西南文化研究

- 178/张君勱与民族文化书院 沙文涛
- 193/略论 1923 年于昆明召开的九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曾黎梅
- 204/1922 ~ 1931 年腾越海关十年报告 康春华译
- 224/民国学人对滇桂边疆的社会调查研究 王振刚
- 237/杨毓骧访谈录 口述：杨毓骧 执笔：徐何珊
- 278/乡国之间——近代云南乡规民约浅析 刘 欣
- 298/三线建设对云南民族地区社会生活变迁的影响 高 宏



从“毒”字说开去

——朱德与唐继尧关系中的一个问题

谢本书

有一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近些年来，经常读到些文史论著中常爱引用朱德的一句话是‘最后还借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代我斩断’，但这句话出自何处，作者均未交代。我留心查找后才得知，这句话出自1937年朱德在延安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原话中并没有‘毒’字。我相继看了近几年出版的几个版本的《朱德自述》，书中的这句话均没有‘毒’手一字出现，定是有人在引用时恶意加进去的，而加了‘毒’字的这句话又被后来的研究者反复引用，客观上起到了丑化唐继尧的作用。”^① 这位先生的这段话，核心问题是这个“毒”字，是有人“恶意”加进去的。真的是这样吗？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需要交代这个问题的相关背景，看一看“毒”的含义可能性是否存在。

^① 《朱德与唐继尧关系新探》，《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2011年，第295页。



1920年初,由于唐继尧的对外扩张,引起了新一轮的川滇战争。滇军先胜后败,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被打死在四川泸州郊外,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收集残军,以“士兵厌战”为由,班师返滇,驱逐唐继尧。驻昆明附近的滇军叶荃第八军,与顾品珍部配合,宣布倒戈反唐。而唐部邓泰中、杨蓁,也要求唐继尧“让贤”,唐无可奈何,遂于1921年2月8日天未明时离开昆明,流亡香港。顾品珍率部进入昆明,遂以滇军总司令名义统治云南。

1922年3月,唐继尧不顾孙中山的北伐事业及“制止令”,竟率部4000人从广西打回云南。顾品珍虽然兵多将广,却麻痹轻敌,加上唐继尧收买土匪吴学显,从省内夹击顾部。顾品珍不幸遇难,唐继尧遂轻取昆明,实现了“二次回滇”,重掌云南大权。

唐继尧重掌云南大权后,大街小巷贴满了通缉令,一场充满血腥的捕杀活动开始了。被通缉的人有代总司令金汉鼎,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朱德,原护国第一军参谋长、四川督军罗佩金,警务司令唐淮源,第一梯团长刘云峰,以及滇军著名将领何国钧、项铎、张鉴桂、张子贞、祝鸿基等20多人。其中,罗佩金在追杀中被捕遇难。这就是说,唐继尧不仅杀害了顾品珍,又杀害了罗佩金,而且还准备杀害与顾品珍有关的更多的滇军将领,这其中也包括朱德在内。唐继尧回滇后甚至将“几百名俘虏一同问斩”。“昆明在几个星期之内是一片恐怖与残杀的景象”^①,真有点白色恐怖的味道。

二

法国著名作家、联合文学奖与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吕西安·博达

^① (美)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第157页。



尔成名之作《领事三部曲》中的前两部《领事先生》与《领事之子》，是描绘民初四川和云南社会的文学作品。《领事之子》中有一个故事的描绘，是值得注意的。作者这样写道：唐继尧“二次回滇”、重掌云南大权后，作者的父亲，时任法国驻云南府（昆明）领事的阿尔贝·博达尔去向唐继尧表示祝贺。唐继尧却说，我打回了云南，但“我并不那么高兴，那个我最讨厌的人，他漏网了，此人欠我的账太多了。他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当我派兵讨伐四川时，由于他屡建功勋，便引起了我的注意，就把他当成了一个心腹，并把他提升为上校，我交给他一个团。在四川的那几年，他春风得意，占据着几乎和成都一样大的城市。是什么东西搅混了他的脑袋，使他产生了那些可恶的念头？总之，他挑拨赵（赵又新）以及我在四川的部队，让他们起来反对我。我决心亲自动手把他的脑袋割下来，但当我攻下云南府时，这个家伙溜走了”。这个“家伙”是谁？唐继尧说，就是“叛变的军阀，他的名字叫朱德”。^①作为文学家，这段对话，也许有所夸张，但并非毫无根据，唐继尧的通缉令就是证明。

当时尚在为刚去世的过继父亲守灵的朱德，被迫带着身边仅有的一连人逃离昆明，经滇东北，从三江口渡金沙江，北行到四川会理。而唐继尧竟派一个团的兵力追杀，可见唐追杀的决心。^②朱德所部因而大多被追杀者杀害或缴械，后因得到富有正义感的绿林好汉雷允飞的帮助，才得以化险为夷。^③唐继尧没有抓住朱德，却把朱德在昆明水晶宫的房屋加以没收。^④这一段历史，朱德自然感慨

①（法）吕西安·博达尔：《领事三部曲·领事之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2页。

② 孔祥庚、杨扬：《朱德与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7页。

④ 卜保怡：《朱德人生历程转折的重要见证——昆明水晶宫朱德旧居》，未刊稿。



良多，在他的回忆录中不免指出，护国运动以后，“因为唐继尧想当‘云南王’并且企图控制川、黔，引起川、黔方面的不满。”^①进一步，发表诸如“毒手”之类的话，这应在情理之中。如此追杀、捕杀，是“毒”还是“不毒”，这不是很明白的吗？

三

话又说回来，到底是谁在朱德的那句话中，“恶意”地加上“毒手”的“毒”字呢？这位先生说，引用者未交代，他查来查去都未查到。看来这位先生或读书有限或视而不见。至少，在我的文章引用这句话时，是注明了出处的。有一次，我曾当面向这位先生说明，请查一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朱德传》就明白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在后来发表的文章中，这位先生仍然没有改变。

《朱德传》一书，对这一段历史和这一句话是这样写的：“这一次逃亡对朱德来说并不是不幸，倒是成了他走上新的革命道路的转折点。朱德自己后来回忆时说：‘借着唐继尧的毒手，将封建关系替我斩断。’本来，朱德回云南后一直打算离滇出国，顾品珍的失败和唐继尧对他的通缉，使他更加无牵无挂地从原来的黑暗环境中，踏上一条新的生活道路。”^② 这里引用的朱德回忆中确是有“毒”字的。

这是我见到的有“毒”字的权威著作的记载。朱德的原话、原作者引用时加了个注，见《朱德自传》（手抄稿本）。后来出版的《朱德自述》也引这一句话，确实少了个“毒”字。然而“自述”与“自传”是否为同一版本，因我未见到原件，不敢妄言。即使在

① 朱德：《辛亥革命回忆录》，《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龚希光副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8~49页。



“自述”中没有这个“毒”字，而“毒”的内涵事实上已包含在其中了。从整个事件发展过程来看，这应是很明白的。难道唐继尧对朱德的追捕，伸出的不是“毒手”，而是“友谊之手”吗？何况在《朱德自传》中确实有这个“毒”字呢！难道这个“毒”字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或主编金冲及先生等“恶意”加上去的吗？这样的推论未免过分了一点。

从这个“毒”字说开去，有助于考察唐继尧的为人，也有助于认识朱德与唐继尧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只“毒手”，或这只“手”，推动了朱德走上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在这里有无“毒”字，其实意思是很接近的。客观的历史发展不是在“丑化”唐继尧，而是在“赞扬”唐继尧呢！这也许可以称之为“历史的讽刺”。正如恩格斯所说：“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①唐继尧成了推动朱德走上革命道路的“杠杆”，不是可以感到“欣慰”吗？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



胡汉民与云南河口起义

范德伟

1908年4月30日（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一日）同盟会在云南河口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起义，起义军的领导人主要有三，即黄明堂、关仁甫、王和顺。黄兴也曾一度现身河口，但不到3天即离开。起义军占领河口后，分兵北上，进抵蛮耗、白河桥一线，终因饷弹不继等原因，于5月26日（四月二十七日）放弃河口而退越南。

河口起义在辛亥革命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孙中山、黄兴等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人对之均有很高的评价。孙中山认为“此为予第八次之失败也”^①，并将河口起义与潮州黄冈之役、惠州之役、钦、廉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一起并称，说：“丁未、戊申两岁之间，举事六次，前仆后继，意气弥励，革命党之志节与能力，逐渐为国人所重。”^②黄兴则直言：“河口一役，感动军界，

① 孙中山：《有志竟成》，朱正编：《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自述》，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②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朱正编：《革命尚未成功——孙中山自述》，第94页。



以致复有安庆之役。”^① 史学研究者则视这次起义为同盟会起义由依赖会党而转向清军的拐点，称：“以河口起义为契机，革命派策划武装起义的活动重点，开始转向正式军队，特别是新军”；“这种把策划武装起义的运动重点转移到正式军队，特别是新军方面来，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内，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②

这次起义，除了在前方领导的黄明堂、关仁甫、王和顺等人，还有一位极其重要、关乎全局成败的领导人，他就是胡汉民。那时的胡汉民，是孙中山授命的代表。对于河口起义的将士而言，他的命令等同于孙中山的命令。国民党党史专家冯自由和邹鲁，都曾在他们的著作^③中肯定了胡汉民的作用。邹鲁认为，胡汉民是进取云南的“主其事”者，他是这样说的：“云南之举义，注重河口，以图蒙自，进取云南。以胡汉民驻安南主其事，军事则委黄明堂、关仁甫、张德卿统之。”^④ 但目前的学术界对此认识并不够，有的皇皇巨著在讲河口起义时对胡汉民只字未提，如章开沅、林增平等辛亥革命史专家编写的权威著作《辛亥革命史》，在记述河口起义时就未提到胡汉民^⑤。有的学者也没有重视胡汉民“主其事”的事实，认为“河口起义的最高指挥者应该是黄兴。起义爆发后中山先生就委任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路党军。胡汉民依然负

① 黄兴：《广州三月二十九革命之前因后果——民国元年在南京黄花岗周年纪念会演讲词》，近代史学会编：《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7页。

② 金冲及、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中国同盟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3页。

③ 冯自由著有《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著作；邹鲁著有《中国国民党史稿》等著作。

④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商务印书馆，1945年，第745页。

⑤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5~258页记述河口起义，但未提到胡汉民。



责后勤与统筹；黄明堂、王和顺只是前敌指挥。”^①那么，胡汉民对河口起义发挥过什么样的作用呢？笔者依据各种史料，拟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述胡汉民与河口起义的关系：受命主持桂滇起义，催促发动河口起义，通过接济款项、请派黄兴督军等方案倾力推动河口革命军进兵，致力起义后勤保障、宣传报道及各种善后工作，反思起义失败原因而向孙中山进言改变依赖会党策略。这是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解读河口起义中的胡汉民，希望能够尽量还原胡汉民在当时的历史地位，以有助于认识他所发挥的作用。其中对一些细节，如黎仲实、关仁甫在起义前被拘等，也进行了考证。

一、受命主持桂滇两省起义

8 胡汉民（1879～1936），原名胡衍鸿，字展堂，出生于广东番禺，1905年9月加入同盟会，被孙中山任命为同盟会本部秘书，从此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随后，他主编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以“汉民”为笔名发表过一系列笔锋犀利的文章，成为同盟会内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1907年春，鉴于从越南进入两广和云南边境交通的便利，又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法国的默许与支持，受日本政府驱逐的孙中山，携胡汉民、黎仲实等同盟会领导人，到法国殖民地越南（时人多称为安南），在河内甘必达街（越南独立后改称陈兴道街）61号设立革命军之总机关部，积极策动华侨力量，准备发动以广西为中心，粤、滇为两翼的起义。时孙中山化名高达生，胡汉民化名陈同。为加强领导起义的力量，孙中山又函招黄兴（字克强）前来。孙中山

^① 唐湘雨、姚顺东：《再议黄兴与近代粤、桂、滇边起义》，《学术论坛》2007年第8期。



的计划是“当合广、韶、惠、潮、钦、廉诸军，以连为一气”^①，强调“起义须惠、潮、钦、廉同时发动，以便牵制清军”^②，但部署尚未完成，各地起义已接连发动，先后有潮州黄冈之役，邓子瑜惠州七女湖之役，王和顺钦州、防城之役，黄明堂镇南关（今友谊关）之役，均遭失败。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当局迫于清政府的外交压力，于1908年1月勒令孙中山离开越南。为完成既定之战略任务，孙中山“至是乃将经营粤桂滇三省军事付托黄克强、胡汉民二人代理”^③，转赴新加坡。但孙中山仍旧计划在桂滇两省同时起义，以形成对两省清军的牵制。2月8日，他在一封信函中流露出对此布置的十足信心，称自己虽然“离开河内重过沦落天涯的亡命生活，但留黄兴及胡氏兄弟，委以当地及广西一带的策划事宜。黄兴君更为奋发，已进入某地点。尤以云南军着着准备，照其预定计划开展工作。”^④孙中山所说的胡氏兄弟，就是胡汉民、胡毅生两兄弟。黄兴进入的“某地点”是指钦州，而在云南边境准备起义的，是黄明堂（亦称黄八）、关仁甫（亦名关辅臣、关汉臣）、王和顺（亦名张德卿）等人，“明堂等将镇南关之役退至安南燕子大山之众、潜师于边界者百余人，其散布于车路一带、装为苦力者二百余人。”^⑤这是河口起义的骨干队伍。

从前引孙中山信函可以判断，黄兴在2月初已经离开河内去准备攻击钦州。从此，留守河内的胡汉民，受孙中山委托，已成为统

① 《致张永福函》，1907年6月5日，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404页。

②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第718页。

③ 《丁未广西镇南关革命军实录》，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24页。

④ 《复池亨吉函》1908年2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59页。

⑤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第745页。